



韦伯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导读

顾忠华 著

该书通过对韦伯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观点的层层解读，给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全书的主题思想及立论基础。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现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该导读的出版，意在让广大读者更好地领会韦伯这部成名作的深刻意涵，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这套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顾忠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顾忠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
ISBN 7-5633-5276-7

I. 韦… II. 顾… III. ①新教—研究—西方国家
②韦伯, M. (1864—1920)—哲学思想 IV. B9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382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4.25 字数:93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册 定价:15.0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 读 者

各位亲爱的青年朋友：

这是一本课外读物，想要与大家一同讨论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通常我们读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透过书中所提供的思想观念，澄清一些我们心里的疑惑；而在青年期这个阶段，一个人开始会对周遭的大环境产生质疑，去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文化的理想与价值观或者全人类的命运等问题，特别是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想知道社会文化生成变化原理的欲望更是迫切。我们不敢说阅读了韦伯这部著作就可以解开所有困惑，处于知识爆炸的今天，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寓意深远，已被公认为是现代人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源头，确实值得及早向大家推荐。韦伯的立论基础，来自于他对整个西方文化走向的深刻体会，他认为资

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其所呈现的特征反而处处和某一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也共同构成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譬如说以“职业”为生活的重心、讲求理性计算、注重个人的成就表现等。此一论点,我们将尝试在这本导读中梳理得更仔细一些,帮助读者理解韦伯整个论证的逻辑。由于韦伯的原著有很强的思辨性,我们的解说可能还是脱离不了学术的味道,但在叙述上也尽量使用浅显的文字和实例,让抽象的理论能和生活的现实经验衔接在一起。

这里想强调的是,韦伯虽然以西方的历史作为考察对象来研究宗教和经验间的互动关系,这看起来和我们有段距离,但事实上,他提出的许多观察心得却和台湾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息息相关,我们只要放眼望去,台湾的都市和乡村到处改头换面、新旧杂处,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无孔不入,“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就在我们身边,影响着社会中各种制度的运转。如果纯粹从事物的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常被等同于金钱游戏,或加上一连串罪名,可是很少人真正能穿透表面,发掘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这一套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酝酿出来的生活秩序,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而已,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

格和文化意义，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开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使我们得以更全面地来认识资本主义，给予它一个较公允的评价。在增进认识的同时，我们也就更能了解现代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这或许对个人找出自己所以困惑的理由，以及思索自处之道都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目 录

致读者	1
一、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面对的时代与问题	1
二、韦伯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11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课题	23
四、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29
五、从路德的“天职观”到加尔文的“预选说”	39
六、入世制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50
七、制欲与资本主义的精神	69
八、基督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韦伯的文化比较研究	89
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贡献与限制	105
十、参考文献及推荐读物	118

一、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面对的时代与问题

宗教上认为不休不歇的、有系统的俗世职业劳动，是制欲的最高技术并且是重生与纯正信仰的最确实、最彰明的证据；而这个宗教思想，对于本文所称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人生观之扩张，必然成为想像中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现代的社会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和生态的环境，都与以往大不相同。这种改变的力量从何而来？如果以人类行动的惰性来看，其实人们是不太愿意主动地改变生活方式，很多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常常可以延续数千年，代表着“创新”的不容易。尤其有不少文化相当排斥创新，就像中国过去本在技术上领先欧洲，但到了15世纪、16世纪以后便被大幅超前，并且在19世纪饱受西方国家军事和政治上的侵略，方才出现一连串追求“现代化”的自觉运动。不只是中国，几乎全世界现在都被纳入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不断以现代科技的力量进行各种生产、消费、沟通、交换等活动。这一切的改变，归根究底是发源于欧洲，那么人们不免要问：欧洲

人又是基于何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条件,才能创造出现代文明的雏形,乃至全人类普遍地受其影响呢?

这当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追本溯源的同时,会遇到无数个可能的线索,每一条线索又会牵连到其他条件,如果没有一套清楚的指标,或能够帮助我们下判断的理论构想,光是追踪有限的因果关联便足以让人头昏脑涨,遑论去评价世界历史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究竟孰轻孰重。而如果我们阿 Q 式的认为:每种因素都同样重要,那根本违背了求知的原意,只能说又回到问题的原点,一步也没有跨出去! 另一方面,假使有人对这类问题一开始就预设立场,简单地把西方现代文明的成就归功于单一因素(如种族、地理或气候因素),那又犯了过分简化的谬误,不仅对知识没有助益,反倒容易引起偏见。总之,除非我们不去关心上述“世界史”的大问题,否则面对各种答案,我们必须慎思明辨,了解每一套理论铺陈的论证脉络,以及它所提供的历史证据,以“真理愈辩愈明”的态度检证不同的说法,再据以建立自己的判断。毕竟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不见得能有“一加一等于二”这种清楚明白的答案,牵涉到愈多历史发展和文化因素的问题,愈得依靠庞大的知识背景来思考各种可能的条件组合,即使到最后未必找到“正解”,但是这种解题的过程本身便是重要的思考训练,它的乐趣和准备联考的学习方式完全不同,毋宁说是一种“知识探险”的活动,这一本课外读物希望能够带来一些知性上的刺激,也期盼读者能有兴趣和耐心一起来从事这趟探险之旅!

上面的问题和我们要介绍的经典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这部作品篇幅虽然不多,但是它在社会科学界激起的讨论和受到的重视,不输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历史观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

力，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他发现：人们在思想行动上不只会物质利益的计算，也往往有“理念”上的利害考量，而在西方，尤其是中古时期的欧洲，这种理念上的因素以“宗教”最有代表性，并且能产生实际的导引力量。因此，韦伯试图从欧洲人在宗教态度的转变上，为资本主义后来在西方能够萌芽乃至茁壮的现象找出一套合理的解释，这套解释必须顾及到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以便能够说明“西方为什么会成为今日的西方，而非别的模样”，同时还要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只在西方产生，而不是在别的地区，如中国、印度、中东等古老文明区域”。我们看到，韦伯的提问方式正是前面所谓的“世界史”大问题，他的解答更是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这个理由，我们将详细地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陈述的论点，让大家评断它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究竟如何。如前所述，韦伯的观点不一定要看作是“标准答案”，但是他开启的讨论空间十分宽广，很适合作为我们理解西方文明，甚至回过头来研究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发展的切入点，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经典在知识启发上的意义，读者自己更可以进一步去发掘，在导论里我们愿意先归纳出三点，以供大家参考。

首先，韦伯在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不只是要处理一个历史问题，因此在方法上与一般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历史学者讨论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他们详细记录了欧洲在封建时期的生活情形，以及其后数百年间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技术上发生的变化，譬如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乃至法国大

革命、国家间的战争等等事件。对历史学者而言，重要的是去描述这些事件的经过，让“历史事实”能够如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些事件先后发生的顺序，也不一定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就在这段时间开始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特征，此一发展方向更在后来普遍地影响到全人类的命运。韦伯的这本书可说弥补了历史学者在诠释历史现象之文化意义上的不足，他并不是去一一记载事情的经过，而是想追索出什么力量曾经发挥过“分水岭”的作用。我们在导论开头时提过，人类行为的惰性很强，非必要时很少改变行为习惯，可是欧洲人在某一个历史进程中，却不断地打破成规，创造出许多新的制度。于是旧的经济生产、交易模式改变了，新兴的市民阶级、资本家和劳工阶级出现了；旧的专制王朝被推翻了，新的议会民主制度诞生了；旧的农业技术被淘汰了，新的工业技术持续被发明出来。这种种像滚雪球式的“破旧立新”壮举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的呢？又为什么偏偏是在欧洲的16世纪、17世纪才开始朝此一方向迈进？韦伯始终不满意前人研究过的成绩，他认为应该可以理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得以评断哪些因素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还能比较出西方和非西方文化在起始条件上的不同。所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意识和单纯的历史研究不同，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他不太计较个别历史事实的考证，只是从浩瀚的史料中寻找特定问题的解答。他在方法上强调“理解”，也就是对于行动者设定的行动意义要设法予以掌握，而个人都是生活在团体和组织中，他们的行动意义并非恣意的、可预期的，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因果关联，来推论怎样的行为手段会造成何种后果。循着这种方法逻辑，韦伯锁定了欧洲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新教教派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

群人当时是推动种种改革的核心分子，从他们在世界观、价值观上显示的特点着手，韦伯相信这是解答问题的钥匙。我们看到，韦伯不人云亦云地依样画葫芦，而是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上另辟新天地，也由于他的研究成果不落俗套，所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脍炙人口的一部学术经典著作，对后来的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有莫大的启示。

其次，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涵盖的题材与内容来看，它属于相当综合性的论述，融会了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不过，韦伯自己强调，他这本书的中心主旨是想阐明“宗教”与“经济”两个行动范畴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很容易被冠上“唯心论”的帽子，因为不少人以为经济就是现实利害的计算，是由功利的“经济人”或“经济理性”完全主导，和宗教根本是两码子事。许多人甚至主张宗教是一种迷信，或宗教只不过是物质利益的反映。韦伯则不愿把宗教看得那么简单和空洞，更深一层来说，宗教和经济分别代表“理念”和“利益”两种力量，利益的计算固然可以左右人们的行动，但是历史上无数的例子也证明“理念”（或“信仰”）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凝聚力来导引行动，如早期基督徒的殉教作为、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戒律等等，宗教本身具有的理性更不容抹杀。基于这样的认识，韦伯反对唯物主义者的宗教观，但是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主义只片面地夸大了某一因素的作用，却让自己离真理更远。韦伯的立场是：社会科学本来便要去澄清人类社会各种动机和行动相互的复杂关系，宗教有宗教自身的价值，就像经济有经济自身的价值，它们可以互不相干，但有时候彼此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这些关系有待研究者以具体时空下的实例来加以验证，而非一竿子打翻一艘船，或套用意识形态的框框来扭曲事实。不

过,韦伯这种开放的态度起初并不太明确,尤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处理了宗教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因果链,因此还是招致不少误解和批评,直到韦伯继续发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和《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他的整体研究构想才算清楚浮现。在此也得提醒读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作品,我们下面的介绍亦会引用韦伯其他著作的研究成果,以便更详尽地阐明这部作品的主题。无论如何,韦伯在分析人类社会中的“理念”和“利益”间或是“宗教”和“经济”间的辩证关系上,是很有原创性的一位先驱者,我们阅读他的文章时,不妨将“唯心”或“唯物”等标签搁置一旁,而集中精神了解他如何执简御繁,像庖丁解牛般把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丛结以干净俐落的手法解析明白。

最后,韦伯曾经表示,他是以“生为欧洲现代文化之子”的身份来向历史发问,他一口气列举了西方在对比其他文化区域时明显有“现代特色”的多项指标,如西方的科学、艺术、音乐、建筑、报业,以及各种“专业”训练,基本上都有一股“理性化”的动力,而在公共行政上的科层官僚组织,或是以工厂生产为主的劳动组织,都能逐渐建立起合理的制度,法律上由宪法、民刑法到审判制度的稳定体系也日趋完备,这些典章制度在他处多有各式各样的形式,但唯有在西方组合成优势的“现代”文化,至少从西方人眼中看来,这个发展方向仍是领先其他地区,因此含有“效准”的意义。韦伯不讳言,他是从西方的众多建树回头探讨成功的原因何在,并且特别关注在精神层面的转捩契机。他的这种发问方式,不免令非西方人感觉咄咄逼人,又好像趾高气扬,落入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关于这类批评,固然有几分真实,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做得到的,非西方人一样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同今天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重新扬眉吐气，有些地方西方可能还得开始向东方学习。不过，我们最好小心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过分膨胀，结果反倒掩盖掉虚心汲取历史教训的机会，何况韦伯是从学术上“价值中立”的角度来发问，他的研究是以过去的事实为基础，试图说明西方是在合理的技术和法律制度上，配合了人们采取理性生活态度的能力与取向，方才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欧洲的发展。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基于贪婪本性的营利冲动，相反的，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依靠的是长期经营和合理计算的组织能力，这又和生活方式的系统化和理性化息息相关，所以他“大胆假设”，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曾受到基督新教教义很深的影响，接着“小心求证”，一步步把宗教和经济的关联串联了起来，完成他宗教社会学方面的“世界史考察”。

正因为韦伯的视野不局限在西方，他大量阅读有关其他重要宗教的资料，写下了对儒教、道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古犹太教的研究心得，他的著作无异是搭起沟通东西文化的一道桥，使得我们充分去比较各自的特殊性和共通性。没有异常包容的胸襟与求知的热忱，是无法达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的！面对他的作品，如果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去批评，只显得自己的小气。另一方面，有一阵子流行以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来否定韦伯对中国宗教的论点，因为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文中曾经视儒家的生活哲学为经济理性的障碍，于是有学者批评说“韦伯错了”，儒家传统并不会对东亚现代化有所妨碍，反而是有助于东亚现代化的力量。虽然他们认为韦伯对儒家的判断不正确，但其实他们大都比附韦伯的说法，把“儒家伦理”视作是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这些尝试显示韦伯的著作虽然年代已久，但却仍能 and 最新的“现时”状况产生对话，激发新的研究兴趣，只是不少作者并未能把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

精髓，推论的逻辑也不够严密，因此在实质研究上还未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如前所述，韦伯意在回溯到数百年前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宗教根蒂，在他看来像宗教改革迸发的改造力量是很难重现的，也只有在当时的特殊条件组合之下，新教徒“彻底”地将宗教伦理贯注到世俗的事务里，为现代的经济理性主义提供了精神上的前提，这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的历史情境，与后来资本主义扩张期，其他文化“移植”这套经济体制的成功条件是绝不相同的。换言之，所谓的“儒家伦理”在传统中国确实并没有发挥过促进经济行为理性化的作用，韦伯当时下的断言仍是成立的，而韦伯甚至提到过，资本主义的“精神”在点燃了发动机之后，便逐步地枯萎，剩下这部资本主义大机器自动地运转，其他非西方世界只要模仿这部机器便可以取得同样成就，日本人或中国人都有成功的机会。我们可以想像，如果韦伯今天仍在世，他来探讨东亚经济发展的现象时，不一定非要找到一个能和“新教伦理”功能相等的“儒家伦理”，才足以解释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他可能还是很重视文化上的特殊性，不过这些文化质素就不见得可以归到那一个特定的“宗教”之下，而是在譬如家庭、教育和社会组织等等生活安排上发现“理性化”的因子。总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它的历史背景，我们要避免断章取义，就得好好体会他所提出的问题关联，以及这套理论的适用范围。当然，每一个时代都会投射出崭新的问题，韦伯曾妥切地回应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我们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只在培养历史感，同时也应该对周遭的变迁现象更为敏感，以便形成我们自己的问题关怀。

对于年轻的读者而言，上面举的几个诠释重点，可能还是有些困难，只是我们在面对“经典”之作时，宁愿多花心思想得复杂些，也比简单地抱住刻板公式来得有收获。《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发表后，有不少西方学者也是用十分简化的方式来归结韦伯的思想，譬如不去注意韦伯所说的其他“组合条件”，将宗教的因素放大成唯一的决定要素，又好像这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于是出现了荒谬的推论，典型的例子是主张：既然韦伯说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这么重要，那非西方世界想改善生活，很简单，让大家都去信基督新教，成为虔诚的教徒，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不只是不切实际，并且根本没有掌握到“世界史”的观点，因为人类本来便有文化上的多样性，各种宗教文化也各自有它的贡献和独到之处，持续地吸引着众多信徒，如何可能一夕之间“罢黜百教，独尊基督新教”？韦伯的作品更没有替基督新教或西方文化宣传的用意，他自己对西方的现代社会有许多批评，甚至被称作是“文化悲观主义者”，虽然他强调——历史上看来——唯有在西方产生了“理性化”的发展方向，但是他同时承认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宗教都有建构出各异其趣的“理性主义”类型，所以“理性”不是西方人独享或垄断的能力。社会科学家应该致力的是寻找出不同理性主义的比较点，了解其中的异同以及重建这些理性主义类型实际的历史型塑过程。从东西方文化近几百年来接触的经验来说，“文化冲突”诚无法避免，但是义和团式的心态绝不可取，身为“东方文化之子”的我们应该更着力去深入体会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撷长补短，以争取下一回和平竞争中较佳成果。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能让我们一窥西方现代文化的精神根源，这是韦伯成功的地方，也是我们推荐这部作品的重要理由。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1904—1905年，起先是以论文形式刊登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1919年左右，韦伯决定将此文收录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并且增添了不少注解。中文译本方面，台大经济系的张汉裕教授早年赴

日本求学时，便接触到韦伯的思想，他在 1960 年翻译了《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协志出版社出版，这本译作的文字典雅易懂，但是有所删节，较适合入门者阅读，我们下面引用到韦伯文字的片段，主要是根据这个节译本。至于想参考原著注解的用功读者，可以参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于晓等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全译本的词句也算通顺，只是有些地方的译法和台湾惯用的名词不太相同。除了原著译本外，目前有关韦伯本人和其学术研究的书籍已经不少，我们在最后一章会略作一些介绍，提供给读者选择。接下来，我们还是对韦伯的生平和成就作一番巡礼，加深大家对他的认识。